

■知无不言

危机总是下一个黄金时期前奏

袁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按照英国人卡萝塔·佩蕾兹的划分，自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的五次技术革命里，每次都会引发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经历一个伴随严重衰退的“转折点”。据此分析，由美国“次贷风暴”导致的本次世界危机结束时，也就是一个新的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再次愉快耦合的黄金时代的开始。明智而有远见的市场主体，应当摆脱掉所有的悲观情绪，尽快做好一切准备去迎接。

迄今为止的历史表明，金融危机无一例外地会引发经济衰退，甚至萧条，只是持续时间有所不同罢了。但是，无论哪一次危机，都是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始的前奏。

就眼下正在肆虐的由美国“次贷风波”引发的全球金融市场危机吧，人们看到的，除了历次危机都会发生的股市大幅下跌、信贷紧缩、金融机构倒闭、经济增长放缓之外，更多的是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的飞涨，由此产生对全球通胀的深深担忧，因而很容易联想到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然而，人们似乎忘记了，正是在那次在石油危机和经济“滞胀”中，产生了1971年由英特尔公司首先研制的“芯片上的计算机”，从而开创了以集成电路、微电子和计算机为主的信息通讯化时期，引爆了第五次技术革命。

当前，太多的人一味沉浸在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成倍上涨的忧虑中，而忽略了工业制成品价格在以更大幅度更快下降，尤其是那些电子产品与无线通讯设备。比如光输产品，现在的价格只是七八年前的二十分之一。所以，那位掌管全球第五大电信设备商——华为公司的总裁任正非才会大为感慨：“市场经济的过剩就像绞杀一样。”更不用说，那些越来越便宜的家电和汽车等如今的人们每天都离不开的传统工业制成品了。这说明，尽管少数商品的价格飞涨，但更多工业产品在价格长期持续下降过程中越来越多地进入了普通家庭生活之中。即使从全球范围观察，今天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升。

也正是因为有了技术革新及其扩散，才有了每次的金融狂热和危机，更有危机之后新时代的起步。对此，英国人卡萝塔·佩蕾兹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有着很到位的解释。按照她的划分，自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的五次技术革命里，每次都会引发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新范式在整个经济和社会中的扩散过程，都是一次“巨大的发展浪潮”，而每次浪潮都会经历两个性质很不相同的时期：“导入期”和“展开期”，每个时期大约持续30年。从“导入期”转到“展开期”，总会经历一个伴随严重

衰退的“转折点”。而“导入期”，包括了开启技术革命浪潮的“爆发阶段”，以及金融资本由起初推动新基础设施和新技术集中开发到慢慢地支配整个体系的“狂热阶段”；“展开期”，则包括了新技术——经济范式“占据主导地位而使经济增长趋于稳定和和谐的“协同阶段”，以及投资机会萎缩和市场停滞的“成熟阶段”。

如果说“爆发阶段”是技术的时代，狂热阶段”就属于金融时代，“转折点”则是反思和调整发展路线，协同阶段”属于生产的时代或真正的“黄金时代”，“成熟阶段”便是质疑自满情绪的时代。

而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在上述各个阶段的关系也是不断变化的：“爆发阶段”时的两者是“恋爱”关系，金融资本促进了技术革命的传播；“狂热阶段”中的两者关系破裂，金融资本脱离生产资本，资产泡沫形成，并将金融市场甚至整个经济社会推入到一种赌场状态；而泡沫终究要破裂，所以，崩溃和衰退就成了“转折点”。但衰退导致了制度重组，促使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关系重塑；当两者重新耦合在一起时，也就进入了“愉快婚姻”的“协同阶段”；直到再次陷入困境的“成熟阶段”。

可见，正是在每次的“狂热阶段”，金融资本充当了熊彼特笔下“创造性毁灭”的执行力量，在这个阶段，飞速地“钱生钱”的疯狂幻觉弥漫整个经济社会，在狂热裹挟之下，一切都脱离了真实，一切似乎只存在于纸面之上，甚至连石头也变得“疯狂”起来，终于酿成危机。然而，正是崩溃和衰退的危机，才强制性地促成了新型制度框架，并像一根神奇的缰绳，将金融资本这匹野马勒住，伴同生产资本进入了一个脚踏实地而良性互动的“黄金时代”。历史上，伴随前四次技术革命而在核心国家发生的1793年至1797年的危机、1848年至1850年的危机、1893年至1895年的危机、1929年至1933年的危机，都是典型的由“狂热阶段”进入“协同阶段”的“转折点”，而每次危机之后，也都无不是一个注重真实红利和真实增长的黄金发展期。

现在看来，核心国家正在经历的起始于1971年由第五次技术革命引发的“发展浪潮”，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已然步入了“狂热阶段”。如果2001年的网络泡沫破灭还没有真正终结这次狂热期，则由去年8月开始的美国“次贷风暴”导致的尚未结束的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动荡，可能就是终结这个“狂热阶段”的危机转折点。因为，这次正在肆虐的危机，已经引起了全球特别是核心国家的广泛反思，并开始了强制性的制度框架重组，以及随之而来的发展路线调整。

既然如此，本次危机结束时，也就是一个新的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再次愉快耦合的黄金时代的开始。掐指算来，套用佩蕾兹所观察到的每个浪潮60年左右的时间段划分，1971年起的“爆发阶段”和“狂热阶段”已然经过了37年，也该是“导入期”结束而由“转折点”进入包含“协同阶段”的“展开期”了。由此，明智而有远见的市场主体，应当摆脱掉所有的悲观情绪，尽快做好一切准备，迎接下一次“黄金时代”的到来。



管窥一得 南北信任缺失 全球减排难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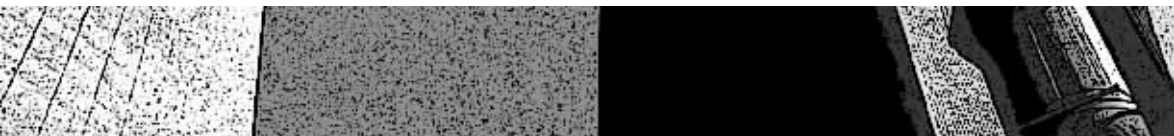
管清友
清华大学
国情研究中心博士

八国集团领导人在本年度峰会上就减排目标联合发表了一份声明，寻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他缔约国共同实现到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至少一半的长期目标，并在公约相关谈判中与这些国家讨论并通过这一目标。这个减排目标的声明没有提及减排所参照的基准年份。据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表示，G8领导人通过的在2050年之前让温室气体排放减半的目标，是以“当前水准”基准。既然没有明确指出基准年份，那么“当前水准”肯定要晚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以及欧盟所倡导的1990年这个基准年份。

实际上，去年6月的八国峰会已就各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形成了一致的表态。八国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同意认真考虑欧盟、加拿大、日本等方提出关于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至少降低50%的建议。去年的声明明确指出了各国减排的基准年份，并提出为在2009年以前达成一项新的全球减排框架协议，排放全球大部分温室气体的经济大国应在2008年底就各自为全球协议做出的具体贡献取得共识。

虽然八国在减排的基准年份上做出了文字游戏，但落实了去年峰会的声明，总算有了一定进步。值得注意的是，在欧盟和发达国家以及一些绿色组织的敦促下，美国改变了立场，与其他发达国家一起做出了减排承诺。

不过，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依然没有跳出“囚徒困境”的窠臼，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没有达成共识。会后，与会的五大发展中国家也发表声明指出，发达国家应在2012年后率先减排，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至少25%至40%，2050年减排80%至95%。



实际上，八国集团均未能实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根据Ecofys咨询公司2008年八国集团气候评分卡》，没有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为防止全球气温升高超过2摄氏度而实现了所要求的减排量，尤其美国表现最差。目前来看，八国集团实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非常困难。因此，五大发展中国家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目标要求发达国家减排没有意义。而且，京都议定书设定的减排目标区间跨度太大，也不利于激励这些国家减排。

发展中国家是否也需要承诺具体的减排义务并公布减排时间表不是科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或者说道义问题。富国应当承担减排的主要责任，这毫无疑问。连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也说，有三种强有力的证据说明为什么这样的成本必须由高收入国家承担：第一，是他们导致了目前这样的问题；第二，他们的人均排放量仍然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第三，他们有能力承担这样的成本。全球现有的人类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中有三分之二是由高收入国家造成的。2004年，美国的人均排放量是中国的5倍，印度的17倍。

要实现全球气候政策良治，光靠征收碳税和清洁发展机制（CDM）是不够的，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补偿机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很难实现合作。理由很简单：你们富国把气候弄成这个样子，凭什么让我们来买单？

但问题在于，没有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减排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而全球减排的时间越晚，需要减排的数量就越大，减排的手段也需要更为激进。时间不等人！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参与进来，到时候受害的是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发达国家。

中国是比较特殊的一员。目前面临的情况是：人均排放低，总量排放和增量排放高，中国对减排计划的态度既可以是保守的——坚持发展中国家立场，也可以是激进的——坚

持G8的立场。中国既可能面临非常尴尬的境地，也可以选择积极主动的立场。如何选择，完全取决于我国对外部环境和基本国情的判断。

我不赞成用阴谋论的思维来看待国际上的减排压力。稍早时候，我曾去参加中国外交学会与英国气候组织举办“高端对话：全球气候变化趋向与中国未来低碳之路”。当时有人问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西方国家希望中国怎么做？布莱尔表示，西方社会希望得到中国一个可置信的承诺，以表明中国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态度（大意）。东西方的思维方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往往习惯于努力做，但还没有习惯努力说。而西方社会是很在意我们怎么说的。在我看来，有时候在国际场合，怎么说其实也挺重要的。实际上，中国一直是积极的姿态应对气候变化。但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没有就减排的中长期目标做出承诺，也没有公布中国实施减排的时间表。

长远来看，国际环境对于中国崛起至关重要。良好的国际环境意味着中国必须通过承担国际义务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同时，中国需要利用这种良好的国际环境促进国内改革与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积极参与减排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外部推动力，与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指导思想也是一致的，中国是可以为世界做出绿色贡献的。

现在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很大。西方大国的总统、总理们来到中国就谈气候变化，在国际场合就更不用说了。我们毕竟已经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第一还是第二有点争议），增量排放最大的国家。未来我们很可能还会面临诸如绿色贸易壁垒等措施的限制。这些措施到最后可能是逼着我们不得不减排，走低碳经济之路。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更主动些呢？而对于我国决策者来说，这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层面的决策，而是一个长远的政治决策。

■斜阳芳草

美的经济学与经济学的美

丁聘聘
浙江财经学院金融学院副教授
经济学博士

美是自由创造的形象体现，而自由创造又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合规律是真，合乎目的性即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就是真与善的统一体。经济学探求真，更包含着善，因此它是一门美的科学。经济学之美不仅体现在它的形式，也表现为它的内容与实质。

经济学不仅是真的科学，更重要的，它也是一门善的科学。光从它定义我们就可看出“心怀天下”的品格。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提出：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務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

现代心理学将人的意识结构分为认知和意向两个方面。认知是对世界的认识，具有客观性；意向是对世界的需要、态度，具有主观性。认知表现为经验认识和科学认识活动，意向表现为价值态度和价值观。科学是人对世界的系统化、理论化的客观认识，因此被称作工具理性。意识形态是人对世界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主观价值，因而被称为实践理性。经济学既包含着理论认识，也包含着价值观念——它是工具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完美结合。

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认为，经济学有两个根源，其中一个，即经济学与伦理学、政治学中有伦理观念的联系，为经济学规定了不能逃避的任务。另一个根源就是经济学与“工程学”方法的联系（《经济学与伦理学》）。森所谓的两个根源与意识结构中两个方面正好对应。我们知道，经济学本来就存在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区分。实证经济学只研究经济本身的内在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分析和预测人们经济行为效果的经济学。它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规范经济学则是依据一定价值判断，提出某些处理经济问题的标准，同时研究如何才能符合这些标准。它要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一种好的经济理论既要有事实分析，又要有价值判断，这就是工具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结合。

萨缪尔逊有一段名言：社会必须合理平衡市场准则和福利国家繁荣之间的关系。用冷静的头脑（Cool head）告诉我们热切的心（Warm heart），经济学能在保证一个繁荣和公正社会中发挥它的作用”（《经济学》）。好一个“Cool head”和“Warm heart”！我觉得再没有比萨氏更简洁有力的语言来概括经济学的学术品格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习经济学的年轻人都是有福之人，因为他们在学习中不仅接受严格的理性主义训练，更重要的，他们还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德性教育，甚至还在无形中接受美的熏陶。

经济学家为建立一个牛顿式经济学体系的美梦所想激励，一直力图使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中的物理学。17世纪西方理性主义兴起，对数学和科学的狂热崇拜使得各类科学家想通过数学这种标准化的语言来重建现实。从那时开始，人们相信任何一门学科只有运用数学证明，才能真正成为科学。经济学与数学的结合并不是偶然的，这首先是因为经济领域中存在着一系列数量指标（货币、产出等），更重要的是，经济学家将几乎所有经济学问题都可以被归结为一个最优控制问题。因此他们经常依赖“目标函数之一阶导数等于零”这样的数学处理来说明他们对经济问题的理解和解决。没有数学就没有现代经济学。数学在经济学领域的运用，不光使它拥有了美的外衣，更重要的，使它有了锋利的分析工具。而就经济学的内容与实质而言，也并不缺乏“大美无言”的神韵。

经济学之美首先体现在它的均衡理念。自亚当·斯密以来，均衡理念和分析一直统治着经济学界，这可能是由于斯密本人深受老师弗朗西斯·哈奇森自然学派哲学的影响。古典经济学认为，理性要求行为一致、有序和可观测，只有处于均衡状态的事物才是稳定的。经济学中的Arrow-Debreu一般均衡定理，便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精品”。在古典经济学那里，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自利行为，在市场机制“无形之手”的引导下，不仅会导致各自均衡的实现，还会最大限度地促进公共利益，实现经济体的和谐与均衡。1874年，瓦尔拉斯以数学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20世纪80年代，阿罗、德布鲁利用集合论、拓扑学证明了瓦尔拉斯均衡的存在、唯一性和稳定性，以及这种竞争均衡与帕累托最优的一致性等问题。在宏观经济学中，希克斯-汉森等人提出的IS-LM模型，巧妙地克服了凯恩斯内在一致性上的逻辑问题，为其宏观理论找到微观基础，从而将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融为一体，实现了瓦尔拉斯式的延伸。

经济学的美也体现为它的和谐与完整。经济学理论流派杂陈但它们之间并非相互割裂，而是一个有机整体，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美的境界。比如，以马歇尔与瓦尔拉斯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着重研究微观经济行为，主张自由放任。凯恩斯经济学则着重研究宏观经济现象，主张政府干预。这就产生了经济学内部“干预与反干预”的冲突。以萨缪尔逊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成功地将古典与凯恩斯经济学联结在一起。在他们看来，现代经济体是一个国家管理的公共经济部门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私有经济部门的“混合体”。这种混合经济既要有国家宏观政策的调节，又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江户物语

车到东京没有路：单向日本壁垒深

陈鸿斌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辑室主任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资金、人员和信息等要素早已在超越国界自由流动。然而，却有一个经济大国的国内市场却相对非常封闭，外来投资欲进入这个国家面临诸多制约，到处显得碍手碍脚。这个国家就是日本。

日本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日本缺乏能源和资源，虽然有1亿多人口，但其国内市场仍相对有限，所以日本实行的是彻底的两头在外战略。也就是从国外进口能源和原材料，通过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制造出价廉物美的产品，并通过向全球推销这些产品，确立了其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诚如30年前一句广告语所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这里所说的丰田车可以理

解为一如如洪水般畅销到全球几乎所有市场的日本产品。在产品走向世界的时候，日本的投资也理所当然地出现在世界各地。日本在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方面所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其决心也是毫不动摇的。其间即便与美国等国发生贸易摩擦甚至一再出现贸易战也在所不惜，因为非如此日本就别无生路。

然而这几乎就是日本所推行的对外开放的全部内容了。众所周知，对外开放应包括两个方面，即走出去和引进来。战后60余年来，日本在走出去方面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引进来方面却实在无法令人恭维。一个简单而又重要的数据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截止2006年底，日本引进的外资占其GDP的比重仅为2.5%，而英国

为44.6%，法国和澳大利亚也都在30%以上。

日本这样单边开放的理由，一言以蔽之：为了保护本国市场。

由于日本的市场非常狭小，所以始终非常担心外资进入会冲击本国市场，对本国企业产生负面影响。迄今为止，日本通过诸如《外汇法》、《矿业法》等一系列立法措施，对电力、通信、铁路等127个行业限制外资进入，去年又将飞机、武器、人造卫星和可转为反应堆的产品列入限制目录。在所有这些领域，外资的比重如欲超过10%，必须事先向东京政府申报。如对本国电信电话公司，规定外国人拥有的表决权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在广播电视行业，外国人的持股比例不得高于20%。对于海运船舶，则规定其三分之二以上的官员必须由日本人担任。在航空业，外国人的表决权也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公开的理由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维持这些行业的秩序。除此以外，日本还有不少看不见

的壁垒，使外国企业很难打进去。

前不久就有一场轩然大波：一家持有日本电力公司9.9%股份的日本企业要求将其股份增持为20%。今年1月中旬该英国公司提出了申请，日本政府经讨论后于4月中旬“建议”该公司撤销申请，但遭到这家英国公司断然拒绝。因为它在“它看来如果就此打住的话，则日本的电力行业今后就很难吸引外资，而日本的消费者也只能继续支付高昂的电费。日本政府看到对方的无意就范，于是便不再那么温情脉脉，于5月中旬命令该公司停止执行该计划，如违反命令则可能被处以3年以下徒刑。不过这家英国公司并没有被吓倒，它不甘罢休，准备申请复议，如果仍不能获准，则准备通过行政诉讼渠道状告日本政府。日本这家电力公司在全日本拥有67座水电站和核电站，目前还在建设核电站。虽然这家英国公司明确表示“将不对核电站及其基础设施行使股东权力”，但日本政府仍担心此举会影响“公众生活”。这家英国公司还打算让欧盟委员会关注此事，因为在他们看来此举妨碍了日本与欧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和投资活动。而此前的另一案例也已

引起了广泛关注。一家澳大利亚基金为了取得东京羽田机场公司20%的股份，由于不动产不属于法律限制对象，日本国土交通省曾打算通过修改法律对此说“不”，但此举甚至在自民党和日本政府内部也未能获得支持。因为事后修改的法律来适用事先提出的申请，显然不合法程序。

考虑到日本的这一做法在国际社会所引发的反响，日本政府已建立了一个机构，专门讨论此事。该机构针对英国公司的上述案例提出，日本今后必须将其限制外资的范围和根据明确向全世界做出说明，不应过度控制外资对日本企业的收购，力争到2010年使外资占GDP的比重翻一番，也就是提高到10%。即便达到这一目标，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仍有很大差距。事实上，如今这一差距仍在继续拉大。

虽然日本政府一再表明“日本市场一点也不封闭”，但这样的表态丝毫无助于消除外国投资商对日本的不信任。外国投资商如今的关注对象不是日本，而是欧美和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市场。日本经济外资进入所以呈现活力的，也无法有效防止其地位持续下滑。